

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户籍居民

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研究*¹

——基于杭州市的问卷数据

张云武

【摘要】：本文通过 2006 年、2010 年、2016 年三个时间点的数据分析，明确了城市户籍居民（以下称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演变趋势、演变逻辑。（1）过去十年间，对于农民工表示正向认知心理的市民多于表示负向认知心理的市民；（2）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因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而不同；（3）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由 2006 年“比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 2016 年“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4）年龄越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城市出身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低于农村出身的市民；（5）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将导致市民对于农民工产生显著的负向认知心理；（6）性别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不具有显著差异；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与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城市出身者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显著地低于农村出身者；农民工的亲戚朋友与农民工的接触频率越多，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7）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以及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越多，则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弱。（8）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从负向认知演变为正向认知的演变逻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年代的推移，市民对于农民工呈现融合、接纳之势，进而导致市民与农民工的关系逐渐向好，而这种变化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了以构建市民与农民工的关系和谐为内容的和谐社会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并就研究发现与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以及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市民农民工认知心理

作者张云武，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现实背景

1978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 17.92%，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 80%以上的乡村社会。其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以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流动为标志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起来。1980 年城市化率为 19.39%，经过 1990 年的 26.41%，2000 年的 36.22%，2010 年的 49.95%，至 2015 年已增长为 56.10%，即：在 1978-2015 年的 37 年间，城市化率增加了 38.18 个百分点，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因此，过去 37 年间，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迅猛，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乡村社会向着城市社会的转型期。另外，从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看，1990 年还仅为 1672 万人（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经过 2006 年的 1.3 亿人，2010 年的 1.53 亿人，而 2015 年已增长为 2.47 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即：1990 年至 2015 年的 25 年间，城市农民工的数量竟然增加 2.3 亿人，每年增加约一千万人。2015 年我国城市总人口为 7.71 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即：城市总人口中，农民工的比例已达 32.1%，接近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符应：产业工人阶层教育再生产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码：16NDJC031Z）。

长期以来，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技能水平低的影响，无论在就业、劳动保障，收入水平，还是人际网络、生活习惯、居住方式等方面，市民与农民工都存在显著的社会分离。可以肯定地说：前者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后者，前者属于优势群体，而后者则属于弱势群体。另外，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导致农民工存在相当的就业歧视（李长安，2010）。特别是2000年前后，企业改革导致市民中大量的劳动者下岗自谋职业。此时，有的市民更是认为，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导致下岗市民与农民工产生就业竞争，因而更是增强了对于农民工的不满情绪（王桂新，2001；梁玉华，2005）。另外，还有的市民认为，农民工招致城市环境的脏、乱、差（韩华，2004），并恶化了城市的治安环境（林蓉，2009；陈成文、傅健，2007）。

但是，与对于农民工的负面评价相反，政府官员、甚至部分学者对于农民工却做出了正面评价。比如：2009年8月12日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騄表示：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称他们为“城市建设者”（李月，2009）。2014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污水处理项目时，更是夸奖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双功臣”^①（王珊珊，2014）。有学者甚至这样称赞农民工：“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卫生城市”离不开他们，他们为“最佳人居环境”创造了条件，他们与城市建设“同步”前行（凌崎猛，2012）。

上述充满矛盾的观点产生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对于农民工的大量需求、农民工的文化资本缺乏导致的非正规就业（informal sector）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一方面，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他们来到城市，主要从事危险（Kiken）、肮脏（Kitanai）、辛苦（Kitsui）这样的3K劳动，而这样的劳动正是市民不愿从事的职业。另一方面，近些年来，诸如企业主与雇工、城管与商贩等群体冲突以及农民工的讨薪、上访等群体性事件频发，给市民留下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秩序破坏者”的形象，加之媒体的过度渲染，进一步加深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不良印象。

上述现实说明：农民工是一个既受城市接纳、尊重，又受城市拒斥、歧视的社会群体，即：市民对于农具有双重认知心理。另外上述现实还说明：不同年代以及市民中不同阶层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存在差异。

（二）理论背景

认知心理是指某一区域内两个异质性群体表现出的隔离、疏远、拒斥、接纳、团结、包容（H.Collins，2003）。1990年以后，本地居民对于外来移民的认知心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课题。迄今，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国居民对于外来移民的认知心理，并提出了个人特征假设、接触假设、关系网络假设、群体威胁论假设。

其中，个人特征假设是指：本国居民对于外来移民的接纳或者拒斥心理，受个人特征的影响。比如：QuiUian（1995）、伊藤（2005）、松本（2006）分析了年龄、性别、教育年数、职业阶层、收入对于外来移民的排他意识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越大、教育年数越长、职业阶层和收入越低的居民对于外来移民的排他意识越强。但是，濱田（2008）最近研究发现：性别、教育年数对于外来移民的排他意识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越大、职业阶层和收入越低的居民对于外来移民具有显著的排他意识（濱田，2008）。这说明：个人特征对于外来移民的排他意识产生影响，但不同研究的发现存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调查地区、研究方法以及变量设计的不同所致。

接触假设是指：与外来移民的接触与交流将会增强对于外来移民的接纳心理。比如：伊藤（2005）、堀内（2006）的研究就证实了该假设。但是，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社区内外来移民的数量增加，将给本国居民带来政治上、经济上的威胁，因此与外来移民的接触交流，反而会增强对于外来移民的偏见与歧视（谷，2002）。

关系网络假设是指：与外来移民交往并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将会对于外来移民的接纳心理产生正向影响。比如：田辺（2002）研究发现：与外来移民的人际关系亲密度越高，对于外来移民的接纳心理越强。

群体威胁论假设是指：在流入国的经济状况差、就业就会少，而外来移民大量流入时，便容易产生对于外来移民的偏见与

敌意，这种心理尤其存在于与外来移民产生就业竞争的蓝领基层和低收入阶层。另外，流入的外来移民越多，蓝领基层和低收入阶层越感到就业的威胁，从而对于外来移民的偏见和敌意越强（Quillian, 1995; Kunovich, 2004）。

由此可见，国外学者主要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本国居民对于外来移民的认知心理，虽然研究历史短，但已从多维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设。但是，在国内学术界，尽管 1990 年以来农民工问题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但如前所述，相关研究集中于农民工本身的职业流动、求职就业、社会融入等，而有关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却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

（三）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将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作为研究主题，具体分析的问题包括市民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变化的总体状况、演变趋势以及演变逻辑。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无疑影响着两大群体的关系，更影响着社会稳定。为此，国家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比如：2003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意见》，确保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2008 年又制定以维护农民工权益为宗旨的《劳动合同法》。十余年过去了，政府的努力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检测和谐社会建设在这一方面的成果。

二、调查地区及调查样本

调查地区是杭州市。选择该市是因为其经济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流入型城市。比如：2010 年该市户籍人口为 434.82 万人，而农民工为 235.44 万人，约占户籍人口的 54.1%（杭州市统计局，2011）。2015 年该市户籍人口为 532.86 万人（杭州市统计局，2015），而农民工数量已达 340.45 万人（陈芳，2015），约占户籍人口的 63.9%。也就是说，随着年代的推移，杭州市农民工的数量呈现增加之势，当今其数量约占该市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二。

数据资料来自于本人分别于 2006 年、2010 年和 2016 年在杭州市进行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问卷调查。在位于市中心的上城区、下城区和位于城市边缘的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随机抽取街道，并根据街道办事处农民工登记册，在 20 周岁至 75 周岁的年龄群体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共抽取 3589 个样本。其中，2006 年抽取了 865 个样本，有效样本为 703 个，有效率约 81.3%；2010 年抽取了 1134 个样本，有效样本为 1002 个，有效率约 88.4%；而 2016 年抽取了 1590 个样本，有效样本为 1367 个，有效率约 86.0%。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本来同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已产生了明显的职业分化。比如：流入到北京市的河南农民，来北京之初，主要从事废品回收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关系、能力、流入时机的不同，已产生了沿街收购者、货场主、货场雇工、捡拾者这样的阶层分化（唐灿、冯小双，2000）。为了更为细致地考察市民对于不同职业阶层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本文按照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将农民工分为十一个阶层，即：建筑业者、制造业者、出租汽车业者、商业服务业者、个体工商户、流动商贩、城市环卫业者、快递业者、家政服务业者、家庭装修业者、无职业者。

三、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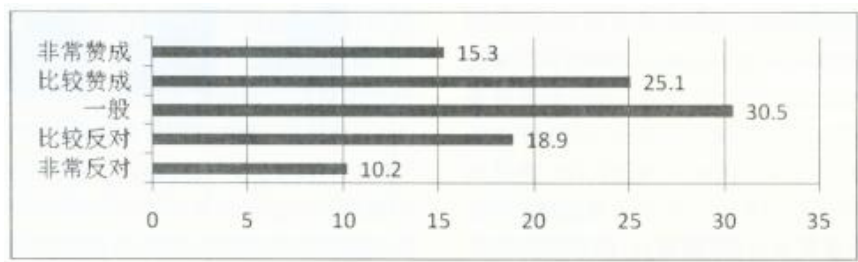
（一）总体情况

根据前述市民对于农民工的两种观点，本文采用如下方式测量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即：农民工来到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不是导致城市脏、乱、差，选项为“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并依此赋值 5、4、3、2、1。分值越高，则说明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反之，则负向认知心理越强。另外，本文将平均值介于 3-4、4-5 之间，分别认定正向认知心理为“比较强、非常强”，而将平均值介于 2-3、1-2 之间，分别认定负向认知心理

为“比较强、非常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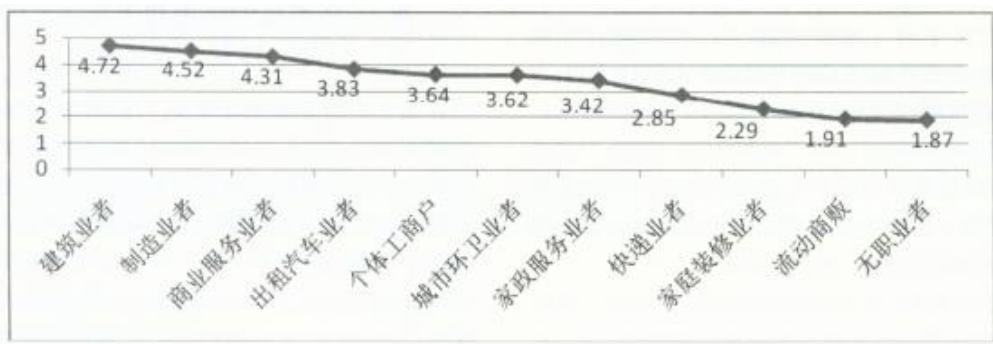
如图 1 所示，2006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对于调查问题，表示“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为 15.3%、25.1%、0.5%、18.9%和 10.2%，即：有 40.4%的市民对于农民具有正向认知心理，有 29.1%的市民对于农民具有负向认知心理，还有 30.5%的市民对于农民的认知心理介于负向认知和正向认知之间。由此可见，在过去十年间，市民对于农民的正向认知心理强于负向认知心理。另外，市民对于农民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为 3.19 分。据此也充分说明：过去十年间，市民对于农民的认知心理表现为正向认知，且认知心理的强度为“比较强”。

图 1 2006 年-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的总认知心理（%）



那么，市民对于不同职业阶层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如何呢？图 2 显示，2006 年至 2016 年，市民对于建筑业者、制造业者、商业服务业者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分别为 4.72 分、4.53 分和 4.31 分，即市民对于这三个行业的农民工表现为正向认知，且认知心理“非常强”；而市民对于出租汽车行业者、个体工商户、城市环卫业者、家政服务业者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分别为 3.83 分、3.64 分、3.62 分和 3.42 分，即市民对于这四个行业的农民工也表现为正向认知，且认知心理“比较强”。但是，市民对于快递业者、家庭装修业者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分别为 2.85 分、2.29 分，即市民对于这两个行业的农民工表现出“比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而市民对于流动商贩、无职业者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分别为 1.91 分和 1.87 分，即市民对于流动商贩、无职业者更是表现出“非常强”的负向认知心理。图 2 说明：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因职业阶层而不同，并不是“一刀切”式地对于农民工表示正向认知或者负向认知，这意味着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是理性的，会根据农民工对于城市建设的贡献以及对于城市脏、乱、差的影响，对其做出正确的认知判断。

图 2 2006 年-2016 年市民对于不同职业阶层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平均值）



（二）变化趋势

图 3 表示的是：在 2006 年、2010 年和 2016 年三个时间点，市民对于“农民工来到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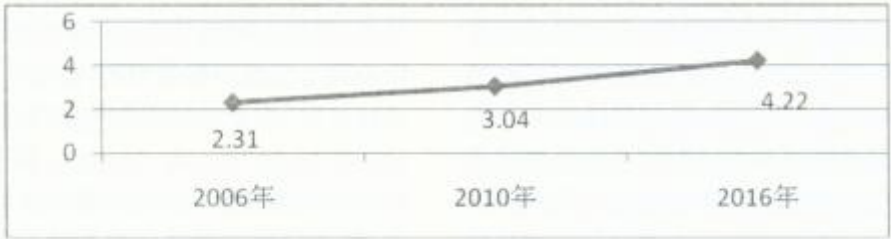
不是导致城市脏、乱、差”问题的认知评价。可以发现，在三个时间点，市民对于上述问题的评价存在差异。其中，2006 年市民对于调查问题的“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五个选项的回答比例分别为 10.8%、20.1%、26.6%、28.3%和 14.2%，即：2006 年分别有 30.9%和 42.5%的市民对于农民工分别具有正向认知心理和负向认知心理，有 26.6%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介于正向认知和负向认知之间。四年后的 2010 年，市民对于调查问题的评价发生了一定变化，表示“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变化为 7.9%、30.3%、30.8%、20.2%和 10.8%，即：2010 年分别有 38.2%和 31.0%的市民对于农民工分别具有正向认知心理和负向认知心理，有 30.8%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介于正向认知和负向认知之间。由此可见，200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还具有负向认知心理，但 2010 年认知心理已演变为正向认知。特别是到了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2016 年市民对于调查问题表示“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变化为 13.6%、36.8%、34.2%、10.6%和 4.8%，即：十年后的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有了重新认识，已经有超过半数（50.4%）的市民对于农具有正向认知心理，仅有 15.4%的市民对于农具有负向认知心理，另外有 34.2%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介于正向认知和负向认知之间。上述统计发现说明，随着年代的推移，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逐步增强，而负向认知心理逐步减弱。

图 3 2006 年至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倾向（百分比）



那么，2006 年、2010 年和 2016 年三个时间点，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强度如何呢？图 4 显示：2006 年、2010 年和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平均值分别为 2.31 分、3.04 分、4.13 分，即：200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表现为负向认知，强度表现为“比较强”；2010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开始演变为正向认知，强度表现为“比较强”，而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明显表现为正向认知，强度表现为“非常强”。图 3 和图 4 的发现说明：在 2006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市民对于农民工由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正向认知心理。该发现在更深层次说明：随着年代的推移，市民对于农民工逐渐接纳，而不是拒斥。

图 4 2006 年至 2016 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倾向（平均值）



四、不同群体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及其变化倾向

图 1 至图 4 的统计发现，可以解答 2006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市民总体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但尚未

明确各个社会群体的差异。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市民中的不同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社会群体选择为不同年龄、学历（受教育年数）、职业、收入、出身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其中，年龄群体划分为青年群体、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②；根据受教育年数，学历划分为低学历者、中等学历者、高学历者^③。根据陆学艺的职业阶层的划分，职业阶层划分为基础阶层、中间阶层和优势阶层^④（陆学艺，2004）。根据杭州市居民的年收入状况，将收入群体划分为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⑤。市民的出身地划分为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其中前者是指来自于乡村、乡镇的市民，而后者是指来自于县城及以上地区的市民。以下是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图 5 显示：2006 年至 2016 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青年群体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2.26 分下降到 2010 年的 2.22 分，然后再下降到 2016 年的 1.97 分。中年群体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2.97 分提升到 2010 年的 3.21 分，然后再提升到 2016 年的 3.28 分。而老年群体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4.06 提升到 2010 年的 4.14 分，然后再提升到 2016 年的 4.31 分。该发现说明：在过去十年间，三个年龄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以及变化倾向存在显著不同。其中，青年群体对于农民工表现为负向认知，且随着年代的推移，负向认知心理的倾向趋于显著，由 2006 年和 2010 年的“比较强”演变为 2016 年的“非常强”；2006 年中年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表现为负向认知，且认知心理“比较强”，但 2010 年开始演变为正向认知心理，并且 2010 年和 2016 年认知心理均表现为“比较强”。在三个时间点，老年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均表现为正向认知，且随着年代的推移，认知心理的强度趋于强化，但均表现为“非常强”。

图 5 三个年龄群体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变化（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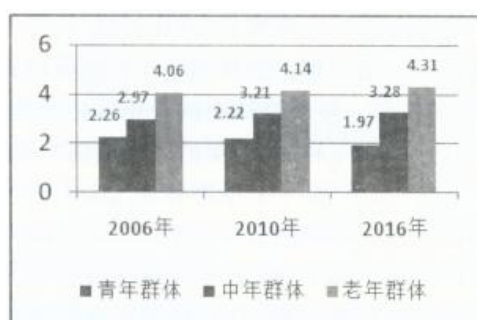


图 6 显示：在 2006 年至 2016 年的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低学历者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2.29 分下降到 2010 年的 2.19 分，然后又下降到 2016 年的 1.96 分。中等学历者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3.12 分提升到 2010 年的 3.15 分，然后又提升到 2016 年的 3.27 分。而高学历者的平均值由 2006 年的 4.16 分提升到 2010 年的 4.23 分，然后再提升到 2016 年的 4.34 分。该发现说明：随着年代的推移，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低学历者表现为负向认知心理，负向认知心理的倾向愈发显著，由 2006 年和 2010 年的“比较强”演变为 2016 年的“非常强”；中等学历者和高学历者分别表现为“比较强”和“非常强”正向认知心理，且强度逐年增强。

图 6 不同学历者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变化（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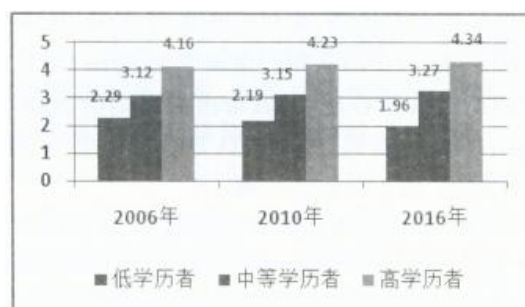


图7显示：在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基础阶层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2.49分下降到2010年的2.22分，然后又下降到2016年的2.04分。中间阶层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3.05分提升到2010年的3.17分，然后又提升到2016年的3.26分。而优势阶层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4.03分提升到2010年的4.18分，其后在2016年又进一步提升为4.27分。该发现说明：在过去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基础阶层表现为“比较强”负向认知心理，且随着年代的推移，强度趋于强化；中间阶层和优势阶层分别表现为“比较强”和“非常强”正向认知心理，且随着年代的推移，强度趋于强化。

图7 不同职业者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变化（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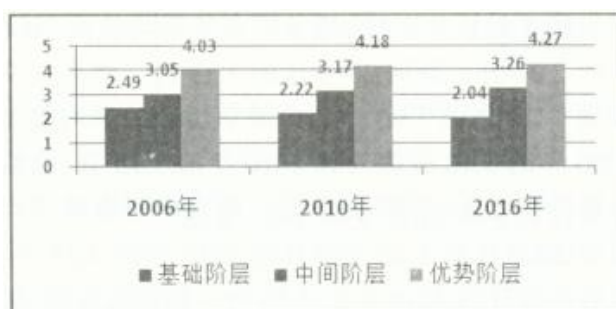


图8显示：在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低收入者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2.31分下降到2010年的2.09分，然后又下降到2016年的1.96分。中等收入者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3.02分提升到2010年的3.11分，然后又提升到2016年的3.16分。而优势阶层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4.24分提升到2010年的4.37分，然后又提升到2016年的4.45分。该发现说明：在过去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低收入者表现为负向认知心理，且强度由2006年、2010年的“比较强”演变到2016年的“非常强”；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别表现为“比较强”和“非常强”正向认知心理，且随着年代的推移，强度均趋于强化。

图8 不同收入者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变化（平均值）



如图9所示，在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农村出身者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4.26分下降到2010年的4.01分，然后再下降到2016年的3.31分，而城市出身者的平均值由2006年的2.12分上升到2010年的2.37分，然后再上升到2016年的3.07分。该发现说明：过去十年间，不同地区出身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及其变化倾向不同，其中农村出身者在2006年、2010年和2016年均表现为正向认知心理，只是认知心理的强度有所不同，2006年和2010年认知心理强度表现为“非常强”，而2016年认知心理强度表现为“比较强”。城市出身者在2006年和2010年还表现为“比较强”负向认知心理，而到了2016年却演变为“比较强”正向认知心理。该结果说明：随着年代的推移，农村出身者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趋于弱化，而城市出身者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趋于强化，但到了2016年，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对于农民工均表

现出“比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

图 9 不同出身者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变化（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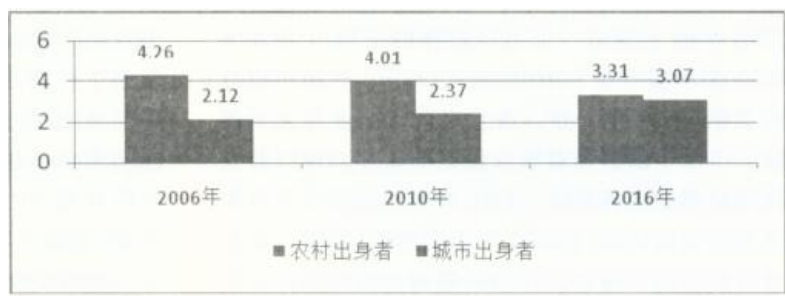


图 5 至图 9 说明：市民中的不同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以及演变趋势不同：（1）从同一年代的横向看，年龄群体中的青年群体、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学历群体中低学历者、中等学历者、高学历者，职业阶层中的基础阶层、中间阶层、优势阶层，收入群体中的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由“比较强”甚至“非常强”的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比较强”甚至“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2）从不同年代的纵向看，随着年代的推移，年龄群体中的青年群体的负向认知心理由 2006 年和 2010 年的“比较强”演变为 2016 年的“非常强”；中年群体由 2006 年“比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 2010 年和 2016 年“比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老年群体一直表现为“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且心理强度逐年强化；以学历、职业、收入为指标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认知心理越呈现出正向认知，且强度愈发增强；农村出身者由 2006 年、2010 年“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演变为 2016 年“比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而城市出身者则由 2006 年和 2010 年“比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 2016 年“比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

另外，除上述市民的群体所属外，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否，也对农民的认知心理产生显著影响。2010 年和 2016 年的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与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相关的问题。从表 1 中可见：在 2010 年和 2016 年，社区内体性事件，不论是否与自己有利害关系，市民均表现为“比较强”甚至“非常强”的负向认知心理，而社区内没有发生过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市民均表现为“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这说明：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会增强对于农民工的负向认知心理，反之则会增强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

表 1 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有无与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平均值）

发生过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				没有发生过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	
负向认知心理				正向认知心理	
与自己有利害关系		与自己无利害关系		2010 年	2016 年
2010 年	2016 年	2010 年	2016 年		
2.04	1.78	2.43	2.67	4.14	4.31

五、认知心理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一）变量设计

以上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基本上明确了市民总体及其不同群体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倾向以及随着年代推移的变化倾向，但是却未明确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影响因素。下面，以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作为因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的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自变量。自变量除性别、年龄、学历、收入、职业、出身地这些个人的人口学特征之外，还设计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四个变量，即：（1）是否有农民工的亲戚、朋友；（2）与农民工的接触频率；（3）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4）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有关这四个自变量与对于农民工认知心理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假设：农民工的亲戚、朋友越多，与农民工的接触频率越多，对于农民工的负向认知心理会越弱一些，而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以及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越多，对于农民工的负向认知心理会越强一些。自变量的操作化测量及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三次调查中，（1）调查样本中的男性与女性相差无几；（2）以中青年为主；（3）受教育年数逐年增加。如果将受教育年数换算成学历，则以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为主；（4）年收入逐年提高，并且通过于 2006 年、2010 年、2016 年《杭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市民的年收入相比，发现两者基本一致；（5）职业阶层以中间阶层为主，且随着年代的推移，人数逐年增多；（6）市民中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的数量基本相同；（7）多数样本没有农民工亲戚或者朋友，但随着年代的推移，有农民工亲戚和朋友的样本逐年增多；（8）与农民工的接触较少，但随着年代推移，接触机会增加；（9）2006 年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较少，但随着年代的推移呈现增加之势；（10）随着年代的推移，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减少。上述（7）、（8）、（9）、（10）说明：过去 10 年来，市民与农民工呈现融合、接纳之势。

表 2 自变量的操作化设计及描述性分析（平均值）

变量名	变量的测量	2006 年		2010 年		2016 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6	0.12	0.51	0.14	0.57	0.16
年龄	年龄（周岁）	45.45	6.81	41.73	5.67	48.9	4.78
学历	教育年数	13.67	1.42	14.19	3.31	14.98	3.62
收入	年收入（元）	19954	10.74	31425	12.11	52176	14.52
职业	基础阶层=1、中间阶层= 2、 优势阶层=3	1.97	1.02	2.08	1.04	2.12	1.02
出身地	农村=1，城市=0	0.47	0.04	0.49	0.06	0.51	0.13
有农民工亲戚、朋友	多=1，少=0	0.21	0.03	0.37	0.07	0.46	0.01
与农民工接触频率	多=1，少=0	0.09	0.01	0.24	0.08	0.32	0.13
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	多=1，少=0	0.34	0.06	0.49	0.06	0.61	0.16
社区内农民工群体事件	多=1，少=0	-	-	0.77	0.13	0.37	0.15

（二）分析发现

表 3 表示的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 1 显示的是 2006 年的统计结果。首先，在人口学特征方面，（1）虽然男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以下简称回归系数）低于女性 0.059 分，但并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2）年龄每增加一周岁、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以及年收入每增加一元，则回归系数分别提高 0.081 分、0.097 分和 0.068 分，并且均在 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3）中间阶层和优势阶层的回归系数分别比基础阶层高 0.178 分和 0.134 分，且分别在 0.1%和 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4）农村出身者的回归系数比城市出身者高 0.202 分，且在 0.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其次，在市民与农民工的关系方面，（1）与农民工的亲戚、朋友多的市民的回归系数比与农民工的亲戚、朋友少的市民高 0.093 分，且在 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2）与农民工接触频率多的市民的回归系数比与农民工接触频率少的市民高 0.067 分，且在 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3）农民工数量多的社区的回归系数比农民工数量少的社区低 0.092 分，且在 5%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模型 1 说明：在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方面，男性与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受教育年数越长、职业地位越高、年收入越多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城市出身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负向认知心理高于农村出身的市民。

表 3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1 2006 年	模型 2 2010 年	模型 3 2016 年
性别 ^a	男性	-0.059	-0.063	-0.067
年龄		0.081*	0.067*	0.077*
受教育年数		0.097*	0.103**	0.091**
年收入		0.068*	0.067*	0.069*
职业阶层 ^b				
中间阶层		0.178***	0.178***	0.201***
优势阶层		0.134**	0.132**	0.085*
出身地 ^c	农村	0.202***	0.211***	0.171***
农民工的亲戚、朋友 ^d	多	0.093*	0.085*	0.087*
与农民工的接触频率 ^e	多	0.067*	0.083*	0.079*
社区农民工的数量 ^f	多	-0.092**	-0.087**	-0.128**
社区内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 ^g	多	-	-0.142**	-0.131**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Adj. R ²)		0.184	0.181	0.186
F 值		16.404***	16.091***	16.661***

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P<0.05, **P<0.01, ***P<0.001； a、b、c 的参考类别分别女性、基础阶层和城市，而 d、e、f、g 的参考类别均为少。

模型 2 与模型 3 的统计结果，与模型 1 完全一致。另外，模型 2 和模型 3 显示：在 2010 年和 2016 年，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多的社区分别比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少的社区的回归系数低 0.142 分和 0.131 分，且均在 1%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该结果说明：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 2010 年和 2016 年的影响结果一致。结果的一致性说明：本文设计的自变量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影响效果，在 2010 年和 2016 年并没有改变，同时也说明以下两个问题：（1）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具有相当的稳定性；（2）在过去十年间，影响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自变量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另外，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Adj. R²) 分别为 0.184、0.181 和 0.186，系数均较高，说明三个模型的统计发现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另外，就表 3 所示的人口学变量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的影响来看，与图 5 至图 9 的统计发现一致，可以说进一步说明了图 5 至图 9 的统计发现的准确性。

六、结语：城市化水平必将进一步提升

如前所述，我国的城市化率由 1978 年改革开放时的 17.92% 增长为 2015 年的 56.10%，37 年间增加了 48.18 个百分点。而作为城市化具体体现的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则呈现爆发之势，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由 1990 年 1672 万人增加为 2015 年的 2.47 亿人，25 年间增加了约 2.3 亿人。本来，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必然，两者亦步亦趋，协调发展。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逐年膨胀，甚至有些城市，农民工的数量已占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出现了过度城市化 (over urbanization) 现象。在此现实下，分析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及其变化倾向，涉及两大群体的关系问题，因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国情调研课题。通过对于 2006 年至 2016 年问卷数据的分析，提炼出如下结论：

第一，总体而言，过去十年间，虽然也有较多 (29.1%) 的市民对于农民工表现出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但有超过 40% 的市民对于农民工表现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对于农民工表示正向认知心理的市民多于表示负向认知心理的市民。

第二，在农民工已产生阶层分化的现实下，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因农民工的职业阶层而不同。总体来讲，市民对于有组织所属、对于城市社会秩序不具有破坏性、以及劳动环境差但对于美化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具有“非常强”或者“比较强”的正向认知心理，而对于无组织所属、对于城市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农民具有“比较强”甚至“非常强”的负向认知心理。

第三，在过去十年间，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年代的推移，由2006年“比较强”的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2016年“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心理。

第四，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因市民所属的社会群体而不同。（1）年龄越大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2）以学历、收入、职业三个指标测量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上述两个发现在2006年、2010年和2016年三个时间点完全一致。另外，城市出身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低于农村出身的市民。

第五，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影响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群体性事件越多，负向认知心理越强。

第六，回归分析发现：（1）男性与女性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并不具有显著差异；（2）市民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与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3）城市出身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显著地低于农村出身的市民；（4）农民工的亲戚朋友越多以及与农民工的接触频率越多的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强；（5）社区内农民工的数量越多，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越多，则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越弱。因此，除性别以外，市民的年龄、学历、收入、职业、出身地与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的关系，与图5至图9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

第七，过去10年间，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从负向认知演变为正向认知，其演变逻辑是：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年代的推移，市民对于农民工呈现融合、接纳之势，进而导致市民与农民工的关系逐渐向好，即：（1）有农民工亲戚、朋友的市民增多；（2）与农民具有社会交往的市民增多，（3）社区内与农民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减少，而这些变化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上面的结论说明三个问题：其一，过去十年间，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作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已经有了成效。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由“比较强”的负向认知转化为“非常强”的正向认知，即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今后应该继续推进以市民与农民工相互融合、相互接纳为内容的社会建设。其二，迄今，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的农民工的负面形象（韩华，2004；林蓉，2009；陈成文、傅健，2007），已不能够准确地说明大多数市民的心理倾向。当今，大多数市民对于农民工已经具有“非常强”的正向认知，认为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研究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观点具有两点相同之处，可以说进一步验证了国外学者研究观点的准确性。（1）本研究发现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市民对于农民具有显著的负向认知心理，与国外学者提出的“群体威胁论”假设（Quillian, 1995; Kunovich, 2004）一致，其产生机制也可以说与国外学者的观点相同，即：在我国，城市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危险、肮脏、辛苦这样的职业领域，这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市民所在的职业领域基本一致，从而产生就业竞争，因此越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市民对于农民工越具有负向认知心理；（2）与农民工接触频率多的市民对于农民具有显著的正向认知心理，这与伊藤（2005）、堀内（2006）的研究发现一致。

2015年我国的工业化为40.5%（国家统计局，2016），今后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必将进一步提升，并导致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城市化率。有学者预测：至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而至2030年将达到60%-65%之间（李善同、侯永志，2002）。届时，我国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基本消失，城乡基本实现一体化，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知心理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否市民对于农民工的正向认知心理将进一步提升？或者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市民与农民工两大社会群体完全融合成一体？是一个很值得追踪研究的课题。

另外，作为市民与农民工两大群体的关系问题，本研究只是研究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一，

市民与农民工两者产生怎样的认知心理，在比较中存在，在相互博弈中产生。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仍然存在就业歧视（朱佰颖，2015；何勤、李倩等，2015）。那么在此背景下，反过来，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对于市民具有怎样的认知心理？其二，社区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将增强市民的负向认知心理，但两者的这种相关性并不是无限的。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在社区的数量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将由负向认知心理演变为正向认知心理？该问题需要对同一城市进行跟踪研究，或者通过比较农民工数量不同的社区才能明确。

注释：

①双功臣是指：农民工为城市地上工程贡献了力量，现在又做地下工程，为城市长久发展打下基础。

②青年群体、中年群体、老年群体分别是指 20-40 周岁、41-55 周岁和 56-75 周岁的市民。

③低学历者、中等学历者、高学历者分别是指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专科与本科学历者、研究生学历者。

④基础阶层包括：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务农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间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优势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⑤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分别是指年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30001-50000 元和 50000 元及以上的收入者。

[参考文献]：

1. 陈成文、傅健：《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犯罪问题》，《理论月刊》2007 年第 11 期。
2. 陈 芳：《杭州市农民工人数突破 340 万人，未来将试行居住证积分管理制度》2015 年，http://www.cnhuadong.net/system/2015-6-28/content_1519913.shtml。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年版。
4.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 4 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
5. 何 勤、李 倩、汪昕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人口与经济》2015 年第 6 期。
6. 韩 华：《略论农民工与城市环境卫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7. 杭州市统计局：《杭州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 年 5 月 12 日。
8. 杭州市统计局：《2015 年杭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杭州市统计信息网，<http://www.hzs-tats.gov.cn>。
9. 李善同、侯永志：《中国城市化若干问题的分析》，载于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10. 梁玉华：《农民工就业领域中的弱势地位分析》，《市场论坛》2005 年第 4 期。
11. 李长安：《转轨时期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2. 李 月：《从“盲流”到“农民工”再到“城市建设者”的变化》，2009 年 8 月 13 日。
13. 凌崎猛：《农民工：城市建设的奉献者》，《农村・农业・农民》2012 年第 5 期。
14. 林 蓉：《浅析农民工犯罪问题》，《法治与社会》2009 第 19 期。
1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16. 王桂新：《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1 年第 1 期。
17. 王珊珊：《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双功臣》，中国新闻网，2014 年 5 月 22 日。
18. 唐 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4 期。
19. 朱佰颖：《农民工就业歧视原因探析》，《老区建设》2015 年第 12 期。
20. 堀内康史、2006、？外国人居住者比率と外国人への寛容性—サイズのプラス効果の検証？、『上智大学社会学論集』30：43～63.
21. 伊藤泰郎、2005、「外国人に対する寛容度の地域比較」、『パーソナルネットワークの地域間都市間比較に対する実証的研究』、平成 15-1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研究成果報告書、128～145.
22. 松本康、2006、「地域社会における外国人への寛容度—隣人ネットワークが媒介する居住地効果」、広田康生、町村敬志、田淳子、渡戸一郎編、『先端都市社会学刀地平』、ハーベスト社、8<32.
23. 田边俊介、2002、「外国人への排他性とパーソナルネットワーク」、森岡清志編『パーソナル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変容』、東京大学出版会、101～120.
24. 谷富夫、2002、「民族関係の都市社会学」、谷富夫編「民族関係における結合と分離—社会的メカニズムを解明する」、ミネルヴァ書房、1～60.
25. 濱田国佑、2008、「外国人住民に対する日本人住民意識の変遷とその規定要因」、『社会学评论』、59（1）：216-230.
26. Collins H., 2003, Discriminatio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 Modern law Review, January 2003, Vol. 66.
27. Kunovich, Robert M, 2004,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 and Prejudice: An Exploration of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Slop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 22～44.

28. Quillian, Lincoln,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586~611.